

书名、作者、ISBN

我读 动态 豆瓣猜 分类浏览 购书单 电子图书 豆瓣书店 2023年度榜单 2023年度报告 购物车(0)

年末回首2023年的迷惘与思索——《多谈谈问题》摘录

 朱俊帆 评论 多谈谈问题
2023-12-29 09:00:50 已编辑 美国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20世纪70年代，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陷入了长达两年的哀悼，在330块纸片上写出一本《哀痛日记》，后来他著名的摄影理论《明室》正来源于此。“一个人刚死，其他人便疯狂地构筑未来。”罗兰·巴特斥之为“未来癖”。他说：“一段时间之前，死亡是一种事件、一种突然出现，而在这种名义之下，它动员人、激励人、使人紧张、使人活跃、使人骤变。而后来，有一天，它不再是一种事件，而是另一种延续——一种呆滞的、无意蕴的、不被叙述的、沉闷的、无援的延续。”

今天的我们，正身处这样一种长久的集体性的哀痛之中。

他意外地说起自己少年时代的一段恋情，背诵何其芳的《预言》，其中一句“你一定来自那温郁的南方”，我竟听懂了，并陷入一种意外的浪漫——你听到春雨滴落、栀子花悄悄开放。

一旦春天到来，他立刻焕发的生机与无穷动力，他在任何时刻都不消退的讲笑话的本能……比起智识上的启迪，这生命中的耐心与跃动，击中了我。他的文章与思想，谈不上多么杰出，却有種难得的常识感，在经历如此动荡的那一代人中，这常识像是宝石。他还说一直困在长沙的自己，就像是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

正常的情况下，两者是并存的，保守能力强大也不等于说那里没有很激进的想法出现，相辅相成、相克相生，往往是压迫最厉害的地方会出现最先进的思想和最杰出的个人。

我对这类巨大、流转的社会戾气的观察，同样始自电影——2019年全球热映的《小丑》。遍布在美国、欧洲多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小丑》的海报令我感到好奇、无从理解。在我看来，这部没有多少“好莱坞相”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球范围内的热映，几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首先是其人物，一个从DC宇宙的裂隙间掉出来的反面角色，脱离了DC世界，脱离与蝙蝠侠的相对叙事、意义结构，小丑一跃而为主角，究竟要表达什么？最令人费解的是，在影片文本中，小丑这个被设定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除了仇恨、愤怒和敌意，他不携带特定的社会意涵与价值，只有某种老梗——俄狄浦斯情结或个体生命创伤，亦不表达任何社会立场和诉求。然而，在片中，小丑式的暴力实施，却引发了全社会的追随、仿效。高潮戏中满城暴动究竟指向什么？何处？何方？我唯一能体认的，只有似乎要从银幕上溢出的巨大的戾气。

为什么一个“反社会人格”的角色制造了影片巨大的、全球性的商业成功，而且在奥斯卡短名单中成了仅次于《寄生虫》的大满贯之作？当然，正是《寄生虫》与《小丑》相连的座次，展示了其中的真意：前者几乎用图解、图示的方式展现了阶级分化和固化的事实，而且以结局中儿子的“计划”表明了反转与获救的不可能；后者冲天的戾气便是这一事实的社会情绪版。由此展开的思考，使我意识到，这正是网络上显现的各种文化症候、社会表象的突出特征：小到网暴事件、网络“战争”，大到右翼民粹、宗教极端主义、不无或充满种族主义气息的民族主义潮汐涨落。

所谓戾气，既是指某种强度、浓度极高的社会情绪，也是指其无定向、无目标的躁郁、狂暴特征。

当我们不再拥有另类的价值取向和别样的世界与未来想象，除了身份政治（而且剔除、悬置了阶级维度）之外，我们事实上难于拥有、获取有意义的价值和思想碰撞。甚至，看似保守和激进的社会立场，也可能因事实上分享着同构的范式与知识型，导致其差异也间或沦为某种姿态和位置的不同。

许多流行文本仍表现出诸多作者敏锐的社会观察和体认，对权力逻辑的明敏窥破，对世间之不公不义的展露。然而，他们不约而同地凸显了对实施社会变革可能造成、经历的动荡、失序的巨大恐惧。叙事过程事实上成了某种经由自我说服而说服人的过程。故事展露了不如人意、甚至不堪重负的现实，但同样有力、甚至更有力地铺陈改变的意图与尝试，只能引起更大苦难的降临。于我，这仍可能在关于20世纪/极端的年代的历史记忆层面上获得解释。

“潜意识自觉”的表征：我们为宜居星球的发现而欣喜，因为我们对自己置身的地球文明的危机状态心明肚知，不仅是能源、生态危机，也是现代主义文明逻辑、发展主义承诺的危机，是不断碰触而无从否认的现代文明的



豆瓣豆品 | 龙年限定年礼上线
豆瓣豆品

广告

> 多谈谈问题



作者: 吴琦
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定价: 65.00元
装帧: 平装
页数: 432
时间: 2023-3

> 侵权投诉通道

玻璃穹顶的显露。非如此，无法解释我们何以对尽管在叙事实施的意义上遥不可及、子虚乌有的替代性家园的发现产生公众性的关注，无法解释此间显露的喜悦、欣慰之情。其抚慰之意在于，即使地球资源消耗殆尽，地球生态全面破坏，我们仍可以将现代主义（此处毋宁说是殖民主义）逻辑继续延伸，在外太空获取无穷发展、无尽扩张（曰“开发”）的空间纵深。

我所谓的“潜意识自觉”，指涉的正是类似表征：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对于现代文明、现代世界的危机深度心明肚知。因为认定其无解，别无选择，而宁肯在种种自我催眠下闭目塞听。但正是对某种语焉不详的未来图景（“文明重启”），或遥不可及的替代方案（移民外太空宜居星球）的欣慰之情，暴露了人们对危机深度的体认前所未有的高度自觉。类似“潜意识”状态形成的原因之一，除去新主流逻辑的强势压制，无疑也是20世纪历史债务的后遗效应。

类似社会心理情态的另一组文化表征，则是网络流行文化场域中，“平行宇宙说”的凸显。从世界电影到中国网络文学，平行宇宙作为一个并非新创的想象与叙事模板在流行。我们先搁置平行宇宙作为围绕着某文本、某人物的同人写作的范式(paro)，而瞩目于流行文化场域中想象和阐释世界的方式；它同样表现了类似“潜意识自觉”或“自我催眠”的特征：我们置身的某种泥足深陷的状态或许是平行的、无穷选择造就的现实之一。即使这一现实崩塌，其外仍有无数现实与自我，仍有无尽可能。

一边是后冷战时代，全球中产阶级对后革命逻辑的认同和共享，一边是发达国家和地区青年中产者一度享有的物质丰裕与精神舒适度，曾造就某种流行文化的主流性和保守化趋向。然而，如果我们将“自我催眠”和“潜意识自觉”视为时间向量上的接续，那么，我也可以将其视为某种变化的迹象。“潜意识自觉”的显露或许可以视为“自我催眠”的失败，尽管展开了持续的自我说服、自我催眠，但潜意识仍可能显现为某种自觉。

今日世界尽管有着深刻的差异和新偏见系统的隔膜或隔绝，但其共同的特征之一是对主流试图建构的幻象系统的洞若观火，至少是漠视状态。或许可以说，世界上的多数人事上清楚自己所置身的幻象系统试图掩盖的现实，看似身陷幻象世界的表象或许是某种选择的结果，或自我说服的结果：并非不知，却宁可不知。获知、确认本身，只意味痛苦或沉重的增量，因为无从改变、别无选择。这间或可以解释某种特定的网络戾气集中指向批判者或自认的启蒙者。如果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结论是可信的：全球经济结构整体倒退回19世纪末的状态，再度重返“承袭型资本主义”（网友们的传神译法：“拼爹资本主义”），因此封闭了社会秩序内的上升空间，那么，重要的不是幻象的揭破、事实的告知，而是有效的另类未来方向的开启。此间，在我们与20世纪的历史遗产之间，尚横亘着20世纪沉重的历史债务。这也是潜意识自觉普遍存在，人们仍勉力自我催眠、自我说服的成因之一。

但当疫情围城，世界上种种既存的问题加剧，且制造着新的问题、困境或危机，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变化，便是曾在后冷战新的文化机制中达成某种社会默契的流畅、顺滑开始展露裂隙：以世界为舞台的例证之一，便是2020年好莱坞奥斯卡颁奖台上，打破了奥斯卡作为美国的国别电影奖一百年来全部惯例，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附赠最佳外语片/已更名为最佳国际电影）一股脑颁给了韩国资本、韩国主创团队、韩语影片《寄生虫》；而“网飞”制作的又一个韩国导演的幽暗故事《鱿鱼游戏》全球热播，开播当日令网飞股价上扬了十余个点，不能不说耐人寻味。而在中国网络文学的场域中，突出的现象或曰表征，则是许多并非以幻想/科幻类型取胜的作者不约而同地改选了科幻类型，而且是其中的克苏鲁设定或废土科幻取向。这究竟是世界文化面对疫情冲击的应激反应，或是某种变化的开始，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纺锤形社会的成立，似乎一度完全瓦解了资本主义体制必然走向两极化，走向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峙、对决之未来的历史判断。在此，就不重复新的贫富分化、中产阶级的消融似乎再次印证了上述政治结论，但全球化的事实，尤其是为互联网、物联网、金融资本所升级的全球资本主义构造，则令这一纺锤形再度金字塔化；但全球化在富人与穷人的社会极化中叠加了富国与穷国，数码技术则在同时构造与瓦解国际中产阶级的过程中，加入非物质生产（者）/第三产业/服务业这一跨度极大及社会意涵、阶级属性繁杂的概念和群体。

在此追问中产阶级概念，是为了和你们分享我的思考路径之一：当我们在文化议题和文化论域中讨论中产阶级的时候，另一个密切相关却通常被遮蔽或搁置了的概念是bourgeoisie/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准确地说，是petite bourgeoisie/小布尔乔亚/小资产阶级（我青年时代，带调侃意味的蔑称：小布）。若要在现代史、思想史、语义学、翻译史的意义上对“bourgeoisie”展开一次知识考古，那显然是一门大功课。简单粗陋地说，“bourgeoisie”与“proletariat”，中文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布尔乔亚与普罗大众，或直接义的富有者与赤贫者，无疑有其现代史、思想史上的明确意涵。但一边，“bourgeoisie”并非绝对等值于资本家群体或资本家阶级，另一边，“bourgeoisie”一词之所以在现代汉语中始终与“资产阶级”这一意译并存着“布尔乔亚”这一音译，正在于，至少在现代汉语的接受和运用中，“布尔乔亚”被赋予了相较阶级指称更宽泛也更含混的含义，后者似乎更多携带着现代社会某种强势主导性的生活方式、态度、价值、趣味。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批量生产的艺术品一词的直接义才是“媚俗”/kitsch。我自己一个老梗是，就“kitsch”的本意而言，媚俗的正确翻译应为“媚雅”——对更高层面的高雅趣味献媚、仿效，但由于工业时代，可以实现这份效颦之举的人数如此之众，才成了“媚俗”。“小布尔乔亚”一词的有趣之处，正在于“小”标明了相对布尔乔亚的阶

级落差，更明确地说，他们根本不是资本的占有者，但中产阶级文化的生产者却大都出自这一群体之中。然而，他们的阶级地位令其文化/价值的生产始终笼罩在资产者的光焰与模板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欧美世界庞大的中产阶级正是小布尔乔亚群体的人数与社会影响力的放大版。因此，中产阶级文化不仅必然以中产阶级价值为底色，而且必然是摹本的摹本。

始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关于欧美中产阶级的知识和由此形成的想象之所以存在着偏差，并遗漏了布尔乔亚的参数，一则由于特定的冷战世界历史格局，令中产阶级重叠了民间社会的功能位置，因此在欧美战后历史的主舞台上出演过颇有力的介入社会、甚或抗衡性的角色；二则是战后欧美中产阶级主体社会成型之际，不期然地对撞上第三世界人民革命（印度独立运动、古巴革命、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越南抗美、中国示范）所引发的世界动荡，因此而诱发了欧美的青春反叛运动、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就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而言，则是反文化运动的进发和其创造力——尤其是诸多亚文化、波普文化的涌流，大众文化工业及产品才得以成为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游击战场。抽离了这个极为具体和特殊的历史时刻、语境，对欧美中产阶级及其大众文化、亚文化的认知便可能出现偏差，乃至形成错觉。

不同于欧美社会的中产阶级，后者一度作为社会的多数，其生活、收入状态为欧美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制造的持续利益所保障。而我们的新中产，至少是介入、进而主导了文化生产的新中产，他们是某种全社会实物经济经由货币化达成资本化过程中财富涌流的产物，却缺乏其社会地位、生活方式的结构性保障，而且只是社会浪潮中的一朵“后浪”。

与其说是新中产强势入主了文化生产，不如说是渐次为资本主导的文化生产锚定了他们所携带、或被召唤出的文化消费欲望，及他们所具有的、而社会多数人不具或丧失了的文化消费能力。因此，为有消费能力的人生生产吻合他们消费愿望、趣味和心理的产品（尽管不时呈现为生产者一厢情愿的想象），使近年来得以进入社会视野、加入公共论域的文化现象具有了突出的中产阶层文化特征。少数，却是可见的、引人瞩目的少数。

目前的问题不是中产阶层文化，而是除了中产阶层文化没有别文化，中产阶层的价值统摄了社会，这种状况是怎么形成的？既然中国中产阶层在整个国家是少数，大部分的人口至少文化消费能力上不在这个阶层，那他们的文化是怎么塑造或者被改变的？——照您刚才的讲法，如何进入了这样一个中产阶层的文化系统？

不是中产阶层文化的下沉，而是作为某种耀眼可见的价值模板、生活示范、趣味榜单——间或主导市场的“买方”而影响社会。

正因为中产阶层作为特定的历史产物，事实上是大的阶层构造的中间物，所以他们的文化或趣味并非某种稳定的状态或序列，相反是因社会的总体情势而变动不居的所在。他们的目光所向，可能是向上的：朝向顶层、朝向强势逻辑；也可能是向下的：朝向底层、朝向弱势群体和社会问题。其一定程度上的文化主导角色，便可能因此而创造不一样的文化，也许这是社会机遇。

当世界进入到一个“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新纪元，当相对主义变成多元化的孪生姊妹，当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同时陷入两难境地，人的内心的完整感正在被某些东西吞噬。而文学，也许只剩下文学，想要捍卫人的完整感，保护人之内在的自由，让人不再因为惧怕孤独而走入某种洪流。

在东欧文学与唐诗之间“跨界”，对于景凯旋来说，是生命中水到渠成的事。在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的当下，他却一直是个从不自我设限的人。“自忖学问之事，不在谋生，而在追求人生价值”，这句话写在《再见》一书的后记里。这句话也是我坚定地追着他对话的理由。

在做学问和追求人生价值之间，看似不言自明的关系在今天已经变得面目模糊。在经验和超验之间，究竟该怎样度过人生？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在《捍卫热情》中写到：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超验的领域真正一劳永逸……我们也总会要返回日常平凡的琐事里：在经历启示后，在写一首诗后，我们要去厨房，决定吃点什么；然后，拿着电话费账单，拆开信封。我们不断地，从受到神灵启示的柏拉图，转向明智的亚里士多德……而这，也是应该的，因为如若不然，在上面等待我们的是疯狂，在下面等待我们的就是厌倦。

景凯旋曾多次引用这段话。东欧作家在经验和超验之间掌握的出色的“平衡术”，是指引他修身治学的一种“法门”。

它对焦的是传统士人的观念，描绘的是在诗意中渴求实现人生价值的灵魂。

进入文学，但总会走到别处去，可不论走到哪里，气象总不会逼仄，因为他的世界里始终站着一个完整的人。想起读《再见》的后记来，景凯旋谈到他欣赏的诗人杜甫，晚年漂泊无依，多灾多难，犹能写下“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疠偏”的诗句，身处疫中，仍觉天地广阔无边。

大时代迫使人们面对同样的问题，要求人的同一性，而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文学教给我们的是人之存在的孤独性，在艺术走过的地方，在诗被阅读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异议取代了期待中的赞同。当其他学科都要求有一个

统一结论的时候，文学是个体维护其独立性的最后的堡垒。此外，处在一个大时代中，我们对亚里士多德的“诗比历史更真实”也会有更深的体会，即以唐诗而论，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是一个大事件，盛唐从此衰落下去，但无论有多少史家记录和描述这段历史，都远不及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羌村》给后人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和人性表现。正如王鼎钧说的，“大人物属于历史，小人物属于文学”，“历史记得一将功成，文学记得万骨枯”。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达不到这样的高度，成为不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我的意思是，小时代没有时代的强烈问题，也没有人性的大冲突，就像流行文化和商业广告提供给我们的世界面目，它迎合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永远宣扬的是相似的成功学，缺乏对人性的洞察力，这或许也是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没有产生文学巨作的原因吧。因此，就文学创作来说，当今的动荡不安也许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期待会有文学巨作产生，深刻地表现这个时代的危机，拓宽文学探索人性的边界。

您信奉康德启蒙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个世俗人文主义者。在今天的语境下，一个世俗人文主义者的特质是什么？他面临的深渊是什么？

景：康德是一个划时代的启蒙哲学家，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建立在宗教去魅的前提下，主张一个人要勇敢地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文艺复兴兴起的人文主义发展到启蒙时代，达到了一个顶峰，信奉人是万物的主宰，今天我们仍然笼罩在启蒙时代的思想光芒中，那就是世俗英雄主义取代了诸神，以代表人的精神世界，从堂吉珂德、哈姆雷特到浮士德、鲁滨逊，正是这一世俗英雄主义的最初体现。

随着上帝的退场，思想家们越来越发现，现代人只有靠文学艺术来拯救人的心灵，康德、席勒、谢林、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等人都提出文学艺术赋予人生意义的作用，于是我们看到，近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于连、拉斯蒂涅、毕巧林、洛根丁、里厄、巴达缪、考尔菲德等，无论主人公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是寻求意义的“当代英雄”。

启蒙主义确立了人是目的，将阿基米德的支点从外在世界转向人的主观世界，放弃了价值根源的绝对之物，此后的理性主义抑或非理性主义，都源于人自身，因而而不可避免地导向价值的不确定性，甚至在理性的自负与非理性的迷狂之间摇摆，托马斯·曼的《魔山》就反映了这种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在某种意义上，20世纪的暴力正是启蒙主义的滥用的实现。

就我自己的教育背景而言，我认同康德的启蒙人文主义，但我也清楚它最终或将导向价值的主观创造，而不是理性的普适性证明。在康德那里，还有着对绝对之物的敬畏，因而具有一种对人类的乐观和确定。但是，现代人已经没有任何敬畏，世俗人文主义者彻底摆脱了绝对者之后，却发现自己孤独地面对世界，无所依傍，所谓艺术的拯救，所谓世俗英雄主义，都如罗马尼亚哲学家布拉加(Lucian Blaga,1895—1961)所说，是将自己的影子当作依靠的支柱。

人类再也回不到过去，甚至回不到康德的时代，这就是现代的“人的境况”，人只能将“行动”本身当作意义的根源。海德格尔强调的是这个，加缪强调的也是这个。世俗人文主义的终极困境就在于，当现代人摆脱了自然时间，进入历史时间而获得解放后，作为一个个体生命，他最终仍将发现，自己依旧走不出自然时间——每个人独自面对的命运。你相信命运吗？我相信人的命运，甚至相信每个文明都有自身的命运。

柏：现代社会的断裂感，也许是“人的异化”的一种典型表现。您自己的经历，却给人某种“跨界感”——从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东欧思想史——我想这是对“人的断裂感”的一种重要反馈。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问您，为何把研究方向从古典中国转向现代东欧。契机当然是具体的，但是动机却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像您在新著《再见》的后记中写的那样，“自忖学问之事，不在谋生，而在追求人生价值”。

景：如我们所见，当今世界处于一个分裂和动荡的时代，统一的价值世界正在分崩离析，这实际上从20世纪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经历了第二次全球化的失败，价值的分裂和冲突愈益加速，再没有什么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有一个人类良善生活的规范，那么你把现代社会的断裂看作是“人的异化”也无不可。但什么是良善生活？仅仅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20世纪70年代的自由思想是在东欧，这方面的知识也使我当下西方的衰落持有自己的看法，西方的自由主义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变种，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失去了它的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精神。

此外，从东欧文学中我也寻找到某种关于人生的答案，要过一种值得过的人生，那就是生活在真实中。

人生有涯而知无涯，我们在现实中的求知，究竟是“好读书，不求甚解”更快乐，还是在一个领域里“上穷碧落下黄泉”更有价值感？

政治史家注重责任伦理，文学史家注重心志伦理。例如，顾炎武从政治史角度对魏晋清谈进行否定，而章太炎却从思想史角度对魏晋清谈加以肯定。那么，哪一种观点是对的呢？

好的文学作品往往像真实世界一样复杂矛盾，而学术研究却不能复杂矛盾，必须遵守逻辑的同一性原则，这就是今天人文学科研究的现实，支离破碎，它的任何答案都意味着是问题。

刘禹锡在他那些杰出的“怀古诗”里选择从永恒的时间流转中看待个体生命的兴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样的胸襟和视野，一扫我读当代文学“无意义”、“无力气”、“无追求”的审美疲惫。

许多人都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下沉年代，精神状态也处于一种下沉状态，这也反映在当代文学作品的气质中。

喜欢刘禹锡的诗，说明你是一个豪爽的人。刘禹锡的一生坎，却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这个人从不相信不可知的命运，具有强烈的人间情怀和进取精神，同时又能将个体生命融入到永恒的群体生命之流中，有勇气面对政治挫折，也有勇气面对新陈代谢的自然生命规律，这使他的诗歌有一种勃勃的生气，即使是感伤，也是积极的感伤。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生死之交，他们生活在盛唐之后，处在一个下沉的年代，性格却恰恰相反，一个爽朗，一个忧郁，但都表现出对真实人生的坚守。正如我前面所说，当今如果说是一个下沉年代，那可能正好也是一个文学的最好时代。我觉得，真正的诗歌精神不在于积极或消极，而应当是心灵的自由，是文学的独立性，拒绝同质化的要求，也就是布罗茨基所说的“表情独特的面庞”。就像刘禹锡和柳宗元那样，用作品反映下沉的时代，同时对抗这个下沉的时代。

从人类历史看，由直觉到思理的发展体现了马克思·韦伯所说的人类的理性化过程，这个过程是不可返回的。

你从自然阶段到历史阶段联想到“活在当下”的话题，这很有意思。在诸神退场后，历史取代上帝成为人生的意义根源，但如果历史没有目的，那么历史意识对于未来就是无意义的，于是留给我们的选择似乎只有“活在当下”。但这也许是西方人今天要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传统的“活在当下”的意思。

在中国文化中，“活在当下”是有特定含义的，即把活着本身当作最高目的，没有生命的过程感和意义感。海德格尔说过，人向死而在，所以人有世界，动物没有世界。由此看来，“活在当下”其实是一个人没有世界的表现。

海德格尔曾引荷尔德林的诗：“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这块大地上。”人虽然像动物一般生活在大地上，但可以通过诗意地存在而让世界敞开，我觉得李白的“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与之有异曲同工的味道，都是要祛除存在的“当下化”，让人生获得意义。

相信事物背后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从而生活在对意义的追求之中，这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的实质。它对我们的启示是不言而喻的，那就是对于那些有追求的人来说，如何过一种具有超越维度的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的日常所遮蔽、所淹没，一生苟且地活着。

多元价值应当建立在一个相同的根本价值基础上，否则就会陷入逻辑矛盾和实际冲突，他说：“多元主义的秩序显然是建立在对特定价值的承认上的，并不是‘价值无涉’的和中立的……一种从它自己的规范中获得的对自己的存在漠不关心，并且把它当成一种美德的多元主义，将注定自己的死亡。”

多元文化主义不可避免的矛盾就在于，如果它禁止极端观念，就会违背自己的原则，如果它容忍极端观念，又会导致自身的失败。我觉得，今天西方社会的情形就是如此。

这正是昆德拉与其他捷克作家的分歧所在，他们从不同侧面显示了现代西方的两种思维。昆德拉的早期作品质疑了历史主义，揭示了历史运动的情感奥秘，还是很有启发性的，他对宏大叙事的解构本身就是思考一个重大的现代性问题，表现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尽管他自己不承认这一点，许多人也不赞同这一点。

西方左翼相信不可逆的线性时间，他们将历史视作人类价值的最高法官，却对良知和善不屑一顾，就像加缪讽刺萨特所说，萨特总是把自己的座椅朝向历史的方向。他们信奉特殊主义的价值，结果却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最终说出“历史的终结”的笑话。而东欧作家却相信普遍主义的价值，并且认为某些人类的基本价值是绝对的、恒久的、超验的，源于一个更高的存在。这是一种传统的观念，也是康德仍然坚持的观念，就像米沃什说的，“我们相信善与恶，就这样”。

中国也存在着秉持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这两种知识分子，不过他们的分歧只是经验层面上的，没有形而上层面的因素，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具有观念史的意义。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有普遍价值的，历史上的那些昏君也从来不敢说自己在行善。但是，因为中国文化缺乏超越性，因而也没有将体制与形而上结合起来思考的传统，宋代理学最终走向伦理，就是一个例子。今天我们重新思考和阐扬传统文化，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应当立足现代，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行动，而不是沉思。

我读过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作家通过采访对话，描述了时代巨变后普通人的精神迷茫，但如果我们熟悉近现代世界文学，会发现每个时代的精神都处在下沉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多余人”，20世纪卡夫卡的“大甲虫”、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恶心”、艾略特的“荒原”、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布洛赫的“梦游人”，都是在描写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不是出于这个原因，便是出于那个原因。启蒙将人性解放出来，就是让人独自面对世界，因此，除非回到遥远的过去，惶惑这个心理疾病就永远是现代人的命中注定。

我曾去常州参观过苏轼纪念馆，那里是苏轼的长眠之处，我想这位杰出诗人的可敬之处就在于，他始终以出世的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无论被贬到何处，都尽力为民众造福，如在海南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中国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人都是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但他们并不气馁，坚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最终超越了自我，同时也超越了时代。

内心自由的人不仅意味着敢于独立思考，还意味着服从自己的良知。现代人已经不再喜欢使用良知这个词，说出这个词会感到很过时，但在这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人性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的时代，我们不仅应当重温康德的话，要敢于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且还要重新唤起自己的良知。只有这样，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和文学，本质上都是在处理宗教祛魅后何为良善生活的问题，对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正如昆德拉所说，有的人仍然忠诚于价值，有的人需要价值却不知道价值何在，有的人对价值不再的世界淡然处之。就此而言，《世俗时代》（加拿大泰勒）这本书的宏观角度可以使我们鸟瞰西方的观念史发展，大致预判未来的世界走向，同时在这个人类精神愈趋退化的时代，对于我们个人思考如何安身立命也许会有所启发。这个世界是如此纷乱，我们的一生该怎样把握自己的命运呢？我想起少年时读过赫胥黎引用的丁尼生的几句诗，它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也许漩涡会将我们卷入浪涛，

也许我们能抵达幸福的小岛；

但在到达终点之前尚有些事情，

一些高尚的事业需要我们去效劳。

个体没有什么大不同。但个体构建起来的整体，就是所谓的集体，现在叫民族国家，差别并不小。这个差别会造成冲突，造成巨大的伤亡、巨大的牺牲、巨大的仇恨。仇恨是有意制造出来的，而且让人认为为此牺牲都是正当的。

更期待黑暗，或者说对黑暗更信任。确切地说，不信任这个世界上的光明，不相信会有更好的东西，总觉得会有更糟糕的东西出现。当糟糕的东西出现，我会说，还会有更糟糕的东西。我在三十岁之前差不多就是这样。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个人的生命历程，这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每一个人的观察一定和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她的经历不一样。

只要他是一个对你有意义的人，他就没有死。

今天的优绩主义不再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结构相关联，它几乎成为对每个个体进行分类、排名的普遍方式，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竞争中，去提高社会阶层。所以，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这种社会是天然不平等的、需要被分化的观念已经不再适用。优绩主义不再是像宇宙秩序一样的东西，而是一种个人化的评价体系，更多地关于个人的成败。

第二点就是迈克尔刚才提到的“暴政”，我觉得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虽然听起来可能有些惊人或者讽刺。为什么这是一种暴政？因为优绩主义基本上不允许对立观点的存在，说你是失败者，那你就是失败者。这也许能解释社会上对优绩主义产生的怨恨和逆反心理。

最后，优绩主义是一个自我包含、自我参照的话语体系，它变成了一种绝对的东西。我认为迈克尔的书《精英的傲慢》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常在作为准则和作为现实的优绩主义之间往返：它是一种我们想要努力达到的准则，还是一种可以被合理化的现实——我们所得到的就是我们应得的吗？这种往返在古典思想里并不存在，因为优绩主义在那时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不是个人的成功体验。

越南战争之后出版的一本书，叫作《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这本书详细地复盘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如何将国家引向战争。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身边的人都很出色，他们有专业知识，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国防专家，但就是这些所谓最出类拔萃的人将美国推到了时代的大败局中。他们缺乏的是判断力，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实践智慧”。

关于市场优绩主义，我想故意提个刁钻的问题——为什么人们投票给特朗普？特朗普赚了很多钱，显然不管从什么标准来看，这都不是他应得的钱。然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反感在市场上赚大钱的人，他们更讨厌在华尔街和硅谷工作的人，还有像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人。这是一个纯粹由市场主导的机制吗？

道德考量的空心化，让国家治理成为了精英之间的技术游戏，人们几乎无法参与决策。我在想，实际情况是不是更糟？不仅是道德考量空心化的问题，还有，技术官僚自身已经成为一个阶级，他们正在积极地建立新的道德准则。

对我来说，优绩主义其实是专业-管理阶级(professional-managerial class)有意提倡的意识形态。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工薪阶层会反感精英，却不反感特朗普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投机者以十分野蛮的方式，在市场上挣了很多钱，人们却觉得没关系。

技术官僚、市场机制和对工薪阶层的羞辱，它们都是大图景的一部分，但是否还有另一只房间里的大象——新的阶级之争？我们实际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市场的暴政，而是一个超越市场的阶级的暴政。

他提出过取消奥巴马实施的医改计划——虽然失败了——这会损害工人阶层的利益；他大幅减税，让大企业和富人阶层从中受益。那工薪阶层为什么还是投票给他，想让他连任？你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反扑精英的原因之一，就是工薪阶层认为精英瞧不起他们。

特朗普的支持者实际上认为美国社会是很公平的。“只要你努力工作，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特朗普的选民比民主党的选民更认同这种说法，这让我很惊讶。但就像你刚才解释的，这其实是符合逻辑的。因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美国社会已经完全被优绩主义所主导，自己早就被排除在外了，别无他法。他们又认为得到自己应得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只能反抗。对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来说，他们并不会根据优绩主义的原则去规划自己或者孩子们的生活，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出头之日。

但在中国，情况几乎正好相反。如果你问中国人，优绩主义是否主导了整个社会，我想他们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中国人会说，那些人有权、有名、有钱，一定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其他因素。尤其是我们既有社会主义的传统，又经历了私有化的过程，如今还有“富二代”“官二代”之类的说法，人们其实对结构性的条件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整体来说，这不是一个优绩主义的社会，但人们会把优绩主义作为一种个体的策略。他们会说，身处这种结构之中，我们普通人别无选择，只有学习，尽全力考上大学，这样至少有张入场券。至于会不会成功，我们也不知道，但人总得先去尝试，是吧？因此，我觉得中国人不会将“优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全盘接受，而是将它作为个人的、家庭的策略，每个人都这么遵循着。这是非常矛盾的。

这就解释了我描述为“悬浮”的现象。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悬在空中”，就像蜂鸟疯狂地挥动翅膀，只是为了在空中停留，你不能有哪怕一秒的放松，不然你就掉下去了，你不能出局，不管胜利的几率有多低。这给年轻一代带来了巨大的焦虑、迷惘和心理压力。

年轻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他们一直认为这不是最糟的，他们总会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对和处理。对于他们来说，现在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假装意识不到各种问题，转而最大限度地获取当下能得到的一切，过着沉溺于工具理性的生活，比如寄希望于攒下更多的储蓄或是证书。他们相信总有一天能够摆脱当下的处境，开启一种新生活。但这当然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另一种新生活与当前的境况是雷同的。

一个公正程序也经常会制造出新的不平等。

优绩主义是在捍卫不平等，而没有提供其他选择。

你的梦并不真正地属于你自己，它只是霸权在你脑海中的投影。做白日梦的时候，你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霸权的俘虏。真正的自我是在附近、在你与周围人的关系中找到的。

我们已经开始了解远在另一半地球的人们生活、他们的抗争，国内外以及整个星球上的不公正行为，这些都对我们的道德反思，如何在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创造意义，提出了新的挑战。所以，认为单一的原则可以在任何层面、每一道德问题上为我们提供正确答案，其实是一种误解。但是，放弃将自身置于世界的愿望也是不对的，我们需要认识到外部赋予我们的身份、社群与责任。

藏传佛教这种众生平等、敬畏生命的观念，对神山圣湖的崇拜和保护，几千年来仍然是一个在实践的现实体系。所以我发现藏区这个现象之后特别兴奋，因为那时做自然保护是逆水行舟，但是一到藏区就很顺畅，立刻觉得应该把它纳入今天的保护体系。比如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以后，就采取了老百姓来做保护者的做法，在三江源国家公园里生活的每一户中都设有一个公益岗位，一举两得，既解决老百姓的生存、生活问题，达到了扶贫目标，老百姓本身也想要参与保护，就会做得很好。从各方面来看，哪怕是从功利的维度来衡量，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可圈可点的示范。

后来媒体把大象的事件作为我们国家自然保护有成效的正面例子，我觉得也对。第一，大象种群起码没有减少，这么大一个物种，在人这么多的环境里，数量能够逐渐增加，说明环境是在改善。第二，大象跑了这么远，没出一件伤人的事，沿途的老百姓也没抱怨，而是花了很大力气来引导大象，让它们最后能回去，当地保护部门和管理部门的做法真是可圈可点，在全球也引起了很多正面的反响。但是，真的不能停留在舆论的这个层面上。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机遇，让大家讨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大象为什么不老实待在自己家里，跑这么老远？根本上还是缺乏天然的食物，那么食物又为什么会缺乏？退耕还林以后，如果是天然恢复的森林，林下有草，可以供大象吃，但如果它们长成了橡胶林——橡胶实际上是一种作物，而不是森林，不光是橡胶本身不能吃，人还要保证橡胶不被杂草淹没，去割林下的草，让橡胶长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栖息地就变得不适宜大象生存。还有一些地方，修了水坝以后，水涨得凶，大象就回不去了，被隔离在比较偏的角落，吃的也不够，它们就去骚扰老百姓，产生很多人象冲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好好来讨论一下怎么解决大象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空间有限，究竟能养活多少头大象？大象的栖息地应该怎么来恢复和营造？橡胶林应该怎么做？因为橡胶种在比较平坦的低海拔森林里面，和大象的栖息地是重叠的，现在橡胶的价格较低，那么是不是能够让一些橡胶林回归成大象的栖息地？这样的讨论应该展开。讨论问题，用坦诚而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会赢得更多的尊重和理解。

中国在某些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比如我们现在用大量财政转移支付来支持更偏远的地区从事生态保护，如果全世界都采取类似的做法，通过一个更加公平的机制，不管是市场机制还是政策机制，让老百姓更加自愿地支持保护，就会更好。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要改变人们的观念，要让人们从观念到行动，这中间有很多步骤，每一个步骤都容易出意外，太漫长也太不可靠。比如买卖人口和妇女问题，你说改变观念，五十年还是一百年？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被牺牲、被侵害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保护，凭什么呢？我更相信通过制度改变人们的行为，通过改变行为去进一步改变人们的观念。观念需要通过制度来落实，需要具体化为行为规范，先让人们按照这种行为规范行事，然后再去改变其内在的观念。简言之，先改变行为，再改变观念。这是更为有效的路径。

社会科学告诉我们社会是怎么样的，法律本身处于社会系统之中，如果对社会一无所知，怎么可能发挥调控社会的作用，又怎么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呢？法律本身更多地偏向技术性，它没有办法解决往什么方向发展的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方向感是社会理论与政治哲学共同提供的。从法律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而言，法律如何发展才能适应社会的演变，这个意义上的方向感需要借助于社会理论；立足于法律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要实现社会秩序的良好法律应当捍卫什么样的价值观，这个意义上的方向感需要借助于政治哲学。

需要用应然的价值追求来制约功能性的适应。适应的时候，属于“不得不这样”，它是一个必要性的问题，但在必要性的选择中，必须考虑良善的秩序如何可能。就法治来说，不要把它消解为简单的秩序安排，而把良善的面向给弄没了。一个社会如果混乱不堪，对所有人都不利，为避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秩序是必要的。在此基础上，还要注意分清好的秩序与恶的秩序，去努力追求一种好的秩序。不能动不动就说因为有了秩序，就觉得好得不得了，因为就秩序本身而言，还可以追求更高层次的良善的秩序。

在我对秩序的想象中，国家的终极目的是国民的自由和幸福，所有制度构建都服务于这一目的，而国民是由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组成。我反对把对抽象秩序的维护放在第一位。在20世纪中期之后，对于法律发展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强调对基本人权的法律保障，所以，利益衡量或制度安排应当有底线，不能把人工具化。在保护基本人权的基础上，还有幸福的价值。现代社会发展几百年形成的共识主要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和权利，积极的方面还需要做与时俱进的探索。我们的法律体系受到19世纪乃至以前的政治哲学影响，现在出现问题，老是说回归古典，但我认为回归古典，在价值诉求上没有问题，但依靠的路径有问题，因为整个社会的基础发生了变化。我关注社会理论，比如哈贝马斯和卢曼，看他们对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的诊断，看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如果把这些作为基础共识，在刑法领域我再作相应推进，在方向感的把握方面，可能会更准确一点。

西哲的迭代，就是论证的迭代，就算是柏拉图和康德，也一路被批判过来，所有的理论都可以批判。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西方的知识分子依托于教会，只忠于造物主，谁都不怕，君主来了我照样可以骂你，因为我后面站的是造物主。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共同体，因而敢于挑战经典，这是西方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东方的知识分子背后没有超验的依托，只能以世俗价值为评定标准。

基督教文化下产生的特殊的教会体系对欧洲文明的形成非常关键。而且在中世纪之前，还存在过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更多倡导的是理性精神，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统一欧洲的时候，人们形成了一种超验的信仰精神，这两种精神一结合，促生了现代文明。但是它太偶然了，可能追溯到最后，要考虑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古希腊是以大部落的形式构成的城邦联盟模式，在东方，像波斯、中国、印度这种广袤的大帝国，有不同的驯化手段。比如孔雀王朝在统治整个印度的过程中，要建立军队体系，因为法律在这个广大的帝国里行不通，只有依托于军事征服。大帝国模式就会导致这个问题，它无法用一种统一的、类似于部落的习惯法去支配广大的疆域和人群，但是古希腊就很巧妙地避开了这些，松散的小城邦模式可以让原始部落的一些习惯法在古希腊得以保留，因为它不需要形成非常庞大的官僚体系。这就让希腊人产生一种观念，不需要浪费大量时间去考虑如何驯化一个庞大的帝国，反倒是在小城邦里可以考虑如何实现政治的正义和自由。古希腊在

统治国家层面应该不如东方帝国，但是他们考虑的都是终极的正义性问题，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三个人完全是一脉相承地在关注城邦精神。

浪漫主义不是我们一般的浪漫概念，它代表了价值的多元性。浪漫主义本身是为了对抗欧陆的启蒙运动而产生的。启蒙运动当时的标准是通过理性精神给人类指一条具有普世性、一般性价值的未来方向。浪漫主义思潮说的是：我可以不那么阳光吗？我可以不那么理性吗？我可以疯狂一点吗？我可以抑郁一点吗？每个个体都有存在价值。伯林在阐释浪漫主义兴起这一点上，既批判了查尔斯·泰勒，又批判了启蒙运动。

马基雅维利把基督教的道德和伦理干掉了，卢梭把人先天性自由的意志干掉了，再之后，意志没有了，宗教信仰也没有了，各个阶层之间开始激烈地博弈和斗争。之后又到了尼采，他对基督教信仰提出了全新的考证，认为以前这些东西全部都有问题，需要站在时代的角色上去重估所有价值，对所有基础性的理念重新进行思辨。在尼采之后，真正所谓的现代化就开始展开了。所以说，这个过程，就是西方文明一层一层被剥夺的过程。形而上的基础、信仰的基础、基督教的基础都被逐一剥掉了，从原有的信仰和现实世界的平衡状态过渡到了世俗化的状态，这导致了现代性的开始，那就是信仰在崩溃，人们在世俗化世界里看不到任何希望和成就。

西方就直接追溯到古希腊或者希伯来时代，而中国就直接回到老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思维范式其实还是沿用轴心时代，只是有变形。这并不是泥古或追溯典籍，更多的是保守主义的思维方式。因为那个时代面临的难度和我们一样，当那个时代的人用那种思维方法解决了社会问题的时候，可以证明那种思维方法行之有效。

不要觉得看了几本西方哲学的书，就可以融合中西方文明。这种融合并不是理性能够建构出来的，它只能在天然的自由竞争中产生，那样产生的文化才是有生命力的。因为人们在某些阶段就是需要传统文化对自己进行心灵的加持和信念的支撑。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如果能够让东西方文化自然地去冲突，自然地去竞争，去大浪淘沙，去伪存真，这种状态就是最好的。

投诉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1人阅读 编辑 | 设置 | 删除

有用 0

没用 0

收藏

转发

回应 转发 收藏



添加回应

☐ 转发到广播

加上去